

在场与追忆

——《东方杂志》建构“辛亥革命”话语的历程

洪九来

摘要:中国近现代期刊史上,《东方杂志》是见证与传播“辛亥革命”政治事件的重要文本。清末,它以立宪派的舆论机关身份在场参与了具体的政治变革活动,并以“选报”的体例广泛记录与“革命”相关的历史事迹,对“革命与改良”的重大政治议题发表了自己的声音;民国以后,它以公共媒介的定位对“辛亥革命”进行持续的追忆,不断激发“革命”符号中的价值元素,从而在其存世期间较为完整地建构了自己的“革命”话语系统。《东方杂志》这种成功的传播现象,既在丰富“革命”话语的内涵与文本样式等方面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资源,也为中国近现代报刊媒介如何进行长时段的、有效的社会舆论动员与思想启蒙提供了有益的历史参照。

关键词:《东方杂志》;辛亥革命;话语建构;张元济;杜亚泉;报刊史;媒介史

中图分类号:G23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019(2012)04-0092-08

作者简介:洪九来,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上海 200241)。

《东方杂志》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寿命最长的综合性刊物,由于存续时段长、版块齐全、篇幅厚实,该刊深具思想资料库的功能,是现代中国许多重大社会政治话题的重要文献记录者。同时,在该刊不同时期聚集的编辑与作者群体又是许多重大社会政治活动的亲身参与者,他们借助该刊表达了独特的政治立场与思想言论。因此,在探讨中国近现代一些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形成与意义时,兼具发言人与传播者双重身份的《东方杂志》(下文简称《东方》)就是一个无法被绕开的媒介角色。本文以《东方》参与建构并持久传播“辛亥革命”话语的现象为研究起点,探究“辛亥革命”的内涵与意义如何在一个媒体的自我表达中得以丰富呈现,同时加深理解一个诞生于晚清政潮中的新式杂志如何长时段担当思想启蒙的职责,渐趋转型为具有公共舆论属性的媒介的成长轨迹。

一、“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的基本言论方式

1902~1903年高涨的“拒俄运动”是中国

近代民族主义得以滥觞的触发点,它既孕育出以“鼓吹、暗杀、起义”为行动纲领的一类激进革命团体,实为广泛的“辛亥革命”过程之开端,同时也激发了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就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等重大议题进行更为艰难的解释与说服工作,为中国社会的全面转型提供深层的思想资源。创刊于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之际的《东方》就明显带有鼓吹民族主义的时代痕迹,这从创刊号上“启导国民,联络东亚”的旗号就可得见。但在晚清社会变革进程中,对外伸张民族大义与对内改革专制弊政是一个并行不二的合力运动,因此《东方》的言论不可能仅仅局促于联俄或联日的外交手腕之争,而是自然会重续维新变法的命题,把刊物的意旨指向推动清政府改革自救这个深度目标。这种舆论倾向是由《东方》创办者的政治身份内在决定的。以张元济为旗帜,在当时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内汇聚了一批同怀改良主义情调的知识分子群体,如高凤谦、夏曾佑、徐珂、孟森、杜亚泉等等,他们均是《东方》清末时期重要的撰稿人或编辑。同时,这群人大多又是晚清立宪运

动中活动时间最长的宪政团体——预备立宪公会的会员,该会会长郑孝胥其时为商务的重要董事,孟森还先后担任《预备立宪公会报》与《东方》的主笔。编辑群体政治身份的同一性以及他们在舆论网络中构建的业缘关系,决定了《东方》在晚清政潮中作为一个在场者所欲表达的基本倾向。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与同样创刊于1904年的《时报》一起,《东方》在上海滩最先“成了立宪派的重要舆论阵地”^①。

1905~1907年,晚清各种政治势力与团体纷纷卷入改良派与革命派的大论战之中,共同构成了云诡波谲、错综复杂的政治场域。新创的《东方》自然摆脱不了时潮裹挟下的“问题意识”界限,参与了各派就满汉关系、革命与改良、暴力与和平等问题所展开的争辩。对于《东方》在这次论战中的思想立场,以往海内外学术界均评之不高,认为它“在大部分时间里紧随梁启超在他自办的《新民丛报》中采取的立场,以致几乎是毫无改动地转载该报的社论”^②。如果仔细探究《东方》表述的具体内容,就会发现上述评价不免流于笼统,验之于该刊实际的传播效果则更不合逻辑。因为《东方》的办刊魅力时人已看得很通透:“上海销行之杂志,以言势力当属《新民丛报》,以言持久则为《东方杂志》,外此率出数期即停,无甚关系。”^③由此可见,《东方》绝不是靠一味附和梁启超等人的主张而立足于晚清政坛的,在其主张论战双方“息事机,消祸乱”的调和主义光晕下,透显出对“满汉之争”与“黄白之争”、“改良”与“革命”等基本关系问题独立思辨的思想底色。有关《东方》编者如何学理化地表述自己政治见解的内容不是本文的要点^④,在此仅从该刊当时有意味的体例特征与选题方式来体味其特殊的话语方式及背后意旨。

“选报”体例是辛亥之前《东方》最明显的文本特征,具体而言,可分为前期综合性、严格

意义上的“选报”与后期专题性、模糊色彩的“选报”两个时期。前期从创刊号(1904年3月)到第5年第6号(1908年7月),《东方》按照社说、谕旨、内务、军事、外交等15个栏目编排内容,每期除一两篇自撰的“社说”外,其余均为从当时报刊中辑录的文章。据研究统计,此期《东方》“搜罗宏富”,共从48种报刊中选录了546篇论说,经过编者的精审加工,凸显出“选报者”的改良主义呐喊,在晚清言论界“展现出一幅趋同一致的舆论图景”^⑤。从1908年起,各地立宪派开始了速开国会的上书请愿活动,把清末“预备立宪”由舆论造势推向实质行动。在这样的政治氛围下,《东方》的体例也发生了相应的调整。该年《东方》第6号上刊出广告,宣布从下期始“重定体例,大加改良”。第7号上署名由“阳湖孟森”主编,新体例分记载、法令、调查、言论、杂俎、文苑、小说等栏目,绝大部分均为新设。最显著的一个变化就是取消了原先无所不谈的“社说”栏,代之以专门的“记载”栏,由孟森主笔的《宪政篇》唱重头戏。在此栏中,孟森或高屋建瓴规划立宪进程,或细致入微评议立宪事项;在具体表述上,依照编年纪事的方式夹叙夹议,大量征引包括谕旨、奏折、法规、报评在内的各种资料。它如法令、调查、言论等栏目也都是围绕立宪活动汇集朝野议论、中外资料。这种围绕一个主要议程按时间实录式汇编资料的刊物形式,从体例上讲属于“选报”类型,它一直持续到1910年底。孟森通过调整栏目设置以及选题意向,使刊物外形上由最初学术化的理论探讨转化为谋略性的政治设计,说明随着晚清政治冲突的高潮即将来临,《东方》论者为了实现立宪理想,“至少在表面上不可能不尽力维护政府,于是言论不免呈现出保守姿态”^⑥。而在介入“预备立宪”的实际行动上,则呈现出某种时不我待、急欲成功

①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 第一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40页。

② 戴仁:《上海商务印书馆189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18页。

③ 徐伯熙:《上海野史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第266页。

④ 关于《东方》在晚清“革命与改良”之争中具体的政治见解,可参阅拙著《宽容与理性》第三章第一节的相关叙述,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⑤ 参见丁文:《“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15页、196页。

⑥ 丁文:《“选报”时期〈东方杂志〉研究》,第373页。

的激进心态。

《东方》一定程度上的激进心态与革命派彻底解决问题的思路就发生背景而言具有同源性,都起自于当时梁启超愤懑所称的“制造革命党”的“大工厂”——颠预自私的满清政府,后者推诿苟且、拒绝变革的顽固行为使晚清一大批改良派由热心到失望、由哀求到激愤,甚至最后走向同情革命的阵营。从“选报”体例变化后的《东方》文本中,我们也能捕捉到立宪派政治心态发生微变的时代痕迹。该刊在保守色调的遮盖下,多渠道荟萃中外各种“立宪”信息,既有为清政府“预备立宪”提供合法资源、资以为鉴的正面意图,同时也隐含着对革命派变革路径的宽容与理解。例如,《东方》当时在诸多栏目对土耳其帝国由假立宪到发生革命的政情有持续、完整的介绍,其意味就非常复杂。1907年,当土皇阿卜杜尔·哈密德二世被迫宣布立宪改制的消息传入国内后,《东方》缀录中外多家报纸消息加以报道,对土皇之举赞誉有加:“吾辈前已詈彼为世界最恶之皇帝,今后则当推崇彼为土耳其开辟以来空前之英主矣!”^①在其掩抑不住的兴奋之情下,实质寄寓着对清廷的莫大希望。不过由于土皇室搞假立宪,最终导致1909年土耳其革命,哈密德二世被废黜。《东方》编者在失望之余痛斥土皇“静言庸违,厚貌饰情,不免流于机诈”,同时赞誉此次事件不是“政变”而是“革命”,由此确信“二十世纪之世界决不容有专制国厕足”^②。由此例可见,在晚清政治秩序转换中,渐进式改良思想是《东方》所秉持的基本立场,该刊编者在感情上难以认同暴力革命的路径,但是他们也切实体味到历史变革中时势与事理并不合一的悖论现象,所以在辛亥前夜对“山雨欲来”的革命风暴也有敏锐的警觉与自省。

二、辛亥年《东方杂志》 对“革命”话语的在场表达

从清末《东方》文本呈现方式与话题立场而言,它毫无疑问是一份支持立宪改良的政论报刊,但是不同于当时由诸多政治党派、团体直接掌控的言论机关^③,《东方》有自己特殊的产业背景,即它依托的母体商务印书馆是一纯商业性的机构,所以刊物天性中带有一定的商业属性,其所有在场表达方式不能以伤害母体的生存为底线,也唯有如此才能使普及教育、实业救国的改良主义理想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商务当家人张元济在出版实践中比较自觉地秉持了这一出版伦理。如1911年初,尚在国外的梁启超为商务新创办的《政法杂志》赐序,很大气地表示不要酬金,但张元济坚持“此间出版终带营业性质”,“违命”奉送了稿酬。在给梁氏的解释信中,他还借机批评了当时官员据媒体为私人言论工具的弊病,认为“京中要人无不各挟一报以自护,从此国中恐只有个人之私言,而无国民之公论”^④。应该说,张元济在媒介的营业性与宣传性、舆论的公与私等关系上的朴素认识,对还处于草创期的《东方》如何处理政治立场、媒介形象与产业命运之间的关系具有导向作用,是《东方》辛亥年对体例再次进行大改良的内部思想推动力。

其实,早在1910年初,《东方》新任责任编辑杜亚泉(署名“华阳陈仲逸”)就提出了改革刊物的设想:“自本年起复聘深通法政、洞明时局诸君,分任论说、记载两类编译事宜,议论必求公正,记述务极精详。”^⑤其意旨就是提升刊物言论的广泛性与公正性,改变此前孟森一人围绕“宪政篇”唱独角戏的状况。但整个1910

① 《土耳其近事调查》,《东方杂志》第5卷11号,调查二。

② 《最近土耳其革命之真相》,《东方杂志》第6卷7号,杂俎栏。

③ 如当时同为立宪党人的郑孝胥的办刊主张就较有普遍性。1909年,他与高尔谦、孟森等立宪公会成员商谈办报馆时认为:“果为之,不可以商业为主;必集饷二十万,募烈士十人,舌战五年,再定继续之办法。”(劳祖德整理:《郑孝胥日记》第3册,北京:中华书局,第1217~1218页)笔者认为孟森在主持《东方》期间的某些做法就受其影响。

④ 《张元济全集》第3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218页。

⑤ 《本社特别广告》,《东方杂志》第7卷1号。

年该刊除了在“论说”一栏中增加了若干新论者之外,其他的变动甚微。所以,到旧历1910年底《东方》7卷12号又预登了“辛亥年东方杂志之大改良”通告,杜亚泉在通告中一方面说创刊7年来该刊“议论之正确、记载之翔实”已为读者所许可,同时又说要与时俱进、满足读者阅读需求,所以“不得不”改良。这是一则逻辑明显矛盾的解释,其间隐喻着该刊理念由传统策士论政向现代公共媒介转型中无以名言的思想痛楚。本次《东方》改刊的宗旨是:“广征名家之撰述,博采东西之论著,萃世界政学、文艺之精华,为国民研究讨论之资料,借以鼓吹东亚大陆之文明。”从1911年始,《东方》果然以全新的面目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就体例的变化而言,一是取消了原先按清政府官署衙门的名号而分设栏目的方法,代之以按现代知识体系分类编排文稿,内容涉及几乎所有的学科门类;二是改变以辑录时论与官方文牍见长的“选报”外形,开始大量刊发各种署名的原创外稿,使之成为略带时评性但以学术性为主的综合类期刊。经此“大改良”之后,《东方》尽褪之前为宪政立言、经世致用的浓厚“政报”色彩,转型为名副其实的现代开放型“杂志”。《东方》此举不仅立时赢得了市场上的成功,使自身从草创期进入快速成长期,更重要的是,《东方》新的办刊理念非常逼近现代媒介的传播本质,即“报纸是一种群体的自白形式,它提供群体参与的机会”^①,因而在当时的中国舆论界具有引领性的示范意义。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雨历程中,《东方》一直坚守这种基本的办刊趋向,从而为自身建构了“长寿”的文化形象。

办刊理念的转型内在驱动《东方》必须呈现选题开放、报道及时、议论理性等公共媒介的文本属性,辛亥年对“武昌首义”这一重大事件前因后果的记录方式就印证了这种转型特色。作为辛亥风暴序幕的黄花岗起义发生不到一个月,《东方》就在8卷3号的“中国大事记”中以《广州乱党抛掷炸弹轰击督署》标题予以

及时报道。接着在第4号上又刊发专文深度分析,认为“此次广州乱党,以数十人攻扑督署,军械锐利,气势凶勇,殊为近年来罕见”;强调清政府不能一味仅恃武力镇压,当务之急是“采舆论以达民隐,去压制以治民情”^②。可以说该论者平实的笔端中流露出既叹服又忧虑的复杂心态。武昌首义的第二天,杜亚泉就撰写了长文《川路事变记》,对这个直接点燃革命的导火索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其最终结论是:综观事件始末,“有不能不归咎于政府大臣与地方大吏之溺职者”;政府失其本分,人民反对对外借款有理^③。同一天,他还就正在进行中的武昌起义赶写了一短评,认为“武汉革命军忽起”的政治根源在于“政府之腐败,立宪之虚伪”^④,可谓先声夺人,一语中的。一个月后,杜亚泉又专门撰写长文《革命战事记》刊登在当年11月出版的《东方》8卷9号上。该文分“革命主义之传播”、“武昌被占”、“各省响应”、“清政府之对付”4个章节,对事件的起源、过程、各政治势力之反应有全面而客观的叙述,另外还随文配发了近50幅各派政治人物、战事场景的珍贵图片,图文并茂,实录性强。在数月之后的8卷10号上,又刊登了杜氏另一长文《革命成功记》,分“各省之现状”、“海军之归附”、“南京及武汉之战事”、“和议之进行”、“边境之被动”5个部分,在叙事顺序上接续《革命战事记》的内容,两文汇整起来,实为国内舆论界第一部完整梳理首义过程的简史。另外,《东方》在武昌起义事发后还通过外稿、“内外时报”等版块广辑中外各方的评述,在“中国大事记”中逐月记录从首义到民国初肇的重要事项,在插图栏中配发众多民国建立及纪念活动的图片,等等。总之,《东方》在当时虽以定期刊物展开对“武昌首义”事件的传播,但由于能灵活运用刊物版块进行集中、追踪式的报道,再加上具有很强的统整信息、深度挖掘的编辑能力,使得该刊的新闻时效性并不逊色于一般的报纸类媒体,而

① 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6页。

② 杜山佳:《纪广州乱事》,《东方杂志》第8卷4号。

③ 伦父:《川路事变记》,《东方杂志》第8卷8号。

④ 高劳:《世界多事之年》,《东方杂志》第8卷8号。

在传播深度上更是“为当时任何定期刊物所不及”^①。

就传播者的角色而言,《东方》及时、客观地报道了众多与“革命”相关的信息,承担了一个公共媒介的伦理责任,初步构建了自己希冀转型的媒介形象。但突发的武昌起义还是置《东方》及其背后的商务知识群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因为就其政治发言人的身份而言,暴力革命的方式确实又不为张元济、杜亚泉等人的改良主义政治理性所认同。例如,杜亚泉当年在刊物上介绍英王乔治五世登基之事,还不忘顺带发挥:如果我国采英国之制,“以国民自治为基础,运用宪政,则国势日隆”,“皇室之尊荣,皇统之悠久”均可无虑^②。看似为清政府打气,实为重申自己的立宪主张。张元济在武昌事发后也对“革命”的后遗症表示了忧虑,认为“默观事变,非速弭战事,恢复秩序,大局危亡,不堪设想”^③。因此,在辛亥年尤其是武昌首义爆发之后数月,《东方》知识群体内心面临着政治理性与革命情势巨大反差的煎熬,刊物面临着发言主体的身份与传播内容的镜像难以协调的困境。这一纠结的状况可从当时张元济的个人境遇中加以体味。一方面,张元济自然没有迎接革命到来的思想预期,所以对当时一些新式革命党人共襄盛举的邀请加以推托,如回绝汤寿潜的邀请时云:“欲建新事业,必得新人物。腐败如弟,断非所宜。”^④另一方面,如果一味标榜自己立宪党人的身份又容易招来时潮的吞没,如当时上海就有革命党人发布传单,指责他受袁世凯指使“造汉阳失守之谣”以博取功名富贵等等,张元济为了使商务的事业免遭牵连,又不得不在《申报》上发表启事辟谣,进行个人危机公关。由人及刊,我们可以感受到《东方》在武昌首义后艰难的办刊处境。所以

说,尽管从辛亥年开始新任主编杜亚泉对刊物外形进行了重新塑造,意图褪去浓厚的立宪党报色彩,但是革命风暴还是来得太急促与“意外”了,处于调适之际的《东方》及其编者们实无充分应对这一现实的心理预备,只能用毫无预告的短暂停刊方式来调理自己的困惑情绪与非常处境,以此退出在狂飙时代的在场表达^⑤。

三、民国以后《东方杂志》 对“革命”话语的不断追忆

民国元年4月,辛亥革命的硝烟暂时散去,停刊四个多月的《东方》于是重新登场。以张元济为代表的商务知识群以旧式改良派的身份步入新兴民国舞台,由政治在场的直接参与者变为政治离场的独立观察者,这种政治身份的潜变使他们能更彻底地回归现代知识分子的位置,更好地利用自己主持的报刊进行理性的思想启蒙活动。有学者赞誉老商务有这一经营方针:“不偏向任何政治主义:无论是出版物或工作人员个人,都不涉及现实政治。如经发现人员行为有偏私于某一政党者,即予解除契约关系。”^⑥客观地讲,这个传统是在商务经营史上逐渐形成的,但主要是进入民国后奠定的。复刊后的《东方》就显现了这样的舆论气息。民初该刊论者不仅以史料家的笔触继续详细实录“辛亥革命”始末,更以史识者的睿智对这场革命进行了精当的价值评估。像杜亚泉等论者当时快速发表了《革命战争》、《中华民国之前途》、《论共和折衷制》、《论中国革新之现状》等一系列深度时评,从不拘党群利益的自由主义立场对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予以总结。1913年初,《东方》借刊行10周年之际推出了一期纪念增刊《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上篇的

① 《追悼杜亚泉先生》,《东方杂志》第31卷1号。

② 伦父:《英皇之加冕礼》,《东方杂志》第8卷4号。

③ 《张元济全集》第1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480页。

④ 张人凤、柳和城:《张元济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46页。

⑤ 《东方杂志》第一次休刊从1911年11月中旬至1912年3月底,长达四个半月,个中缘由未见当时商务的任何记载。王云五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是“因辛亥革命,交通受阻,暂告停顿”。其说概有所隐讳。见王氏《重印〈东方杂志〉全部旧刊五十卷序》,(台北)《东方杂志》复刊第5卷第7期。

⑥ 徐有守:《我所认知的百年老馆的四大出版方针》,王学哲、方鹏程《商务印书馆百年经营史(1897—2007)》,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7页。

“通论”高屋建瓴,对清末民初广泛的政治革命进程进行了史纲性的演绎;下篇的“各论”鞭辟入里,分外交、内务、财政、军政等8个篇章专题论述,对辛亥革命复杂的社会背景与民初具体的政情政象有细致的分析。该增刊成为《东方》在民国以后对辛亥话语进行集体追忆的第一轮文本表征。

民初《东方》呈现的对“辛亥革命”话语追忆式的发言现象,既基于该刊论者维护已有的革命成果、猛力抨击政坛乱象的现实斗争需要,也源自他们坚守的长期启蒙、渐进变革的社会改造意识。扼要说来,杜亚泉等人站在理性主义的高度对刚刚发生的具体革命活动作出了如下判识:首先,高度首肯了辛亥革命在事理上的合法性与手段上的正当性,指出它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任何争夺统治权的战争,而“纯乎为转移统治权之政治战争,一改历代革命战争之面目,实为我革命民族中一种之异彩”^①。其次,对晚清社会革命的动力与路径作出客观、辩证的解析,认为革命派与改良派虽然具体主张不一,但根本目标一致,殊途同归。“由立宪运动而专制之政府倾,由革命运动而专制之特权废”,民国之建立“即由此二大政潮之相推相荡而成”^②。最后,恪守“政治之进步,仰社会之提携”的渐进主义,既抨击袁世凯集团上台后政治倒退的行径,也对试图仰仗一两次激进政治行动就能解决全部社会问题的时潮提出诫告,在民初官制改革、省制改革、外债问题等辛亥余波中表达了折中、稳健的主张。总之,守护革命已有成果而不至于发生倒退、完善革命继续进程而不至于太多波折,这是《东方》论者念兹在兹的主要出发点,诚如杜亚泉强调的:“我国民今日所当兢兢注意者,即在维护此主义(指共和政体,笔者注),不使稍有所动摇,以免他主义之阑入。”^③

以民初杜亚泉在《东方》上开启的追忆革命事件为起点,在此后30多年的历程中,《东方》借助各种契机不断重述有关“辛亥革命”的

话语,激活社会公众对这一重大事件的记忆。如1922年11月《东方》第19卷21、22号为“宪法研究号”,此时正是直系军阀玩弄“恢复法统”之际,该刊借国会议员的制宪之争集中检讨了辛亥革命10年来民国宪政之路的曲折,重申了“临时约法”的基本精神;为纪念创刊20周年,1923年底该刊推出大型丛书《东方文库》,其中第1种《辛亥革命史》就是杜亚泉以《革命战事记》《革命成功记》两篇长文为底稿扩写的,这是国内第一本以“辛亥革命”为题的专门史著;1931年“双十节”发行的第28卷19号为“辛亥革命20周年纪念号”,编者精心策划,邀请名家“再回首”辛亥革命的历史场景与意义,并全方位总结了20年来中国政治组织、财政、教育、对外关系等方面的状况。1941年《东方》新年特大号(38卷1号)主题是“建国三十年纪念”,同样以辛亥革命为起点评析近30年中国社会诸问题,尤为强调革命中的民族主义元素在民族危难之际的当下意义。总之,纵观民国以后《东方》的全部文本,“辛亥革命”话语显然与该刊发生了某种固有的联结,成为一个不断被追忆的对象,这在“辛亥革命”传播史上是一个并不多见的现象。

善于捕捉热点选题、长时段追踪式评析、采用专刊专辑等形式进行强势宣传,这是“长寿”的《东方》屡放异彩的秘诀之一。故而该刊不断记忆“辛亥革命”话语的现象,首先也应该在办刊特色与营销技巧意义上获得解释。但是,一个现代舆论机关的集体记忆功能绝不仅仅是商业意义的,而是一个价值创新的过程,“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建构”^④。《东方》持续表述“辛亥革命”话语,并不是静态地再现1911年的历史场景,而是经过不同时期编辑的层层加工,重构了一个不断向前的革命故事,在历史记忆中形塑刊物自身所秉持的理念与立场。例如,民族主义呼声是《东方》历程中一直延绵未断的一个基本音调,这既是清末时

① 伦父:《革命战争》,《东方杂志》第8卷9号。

② 伦父:《十年以来中国政治通览》上篇“通论”,《东方杂志刊行十年之纪念增刊》,1913年1月,第1~2页。

③ 伦父:《革命战争》,《东方杂志》第8卷9号。

④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3页。

期张元济“文明排外”思想奠定在刊物上的原型底色,也是商务母体作为旧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文化企业在对外竞争中的切身利益使然,当然,更与近现代中国救亡主题的宏大叙事相关联。在《东方》对辛亥话语的不断演绎过程中,尤其是三四十年代抗日战争时期,寓含于“革命”之中的民族主义元素就呈现出被聚焦、光大的情形。在该刊编者当时看来,辛亥革命的主要意义就在于“第一次唤醒了中国民族的自觉”,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起点。辛亥以后,民族主义是中国现代化探索道路上始终一贯的动力源泉,“这几十年中中国突飞猛进的进步,也可以看出这种进步背后的民族精神,是如何的激昂澎湃,而成为中国国家生活中最主要的推动力量”^①。因此,“帝国主义是中国民族最大的敌人,同时亦是改造的最大的障碍。……中国革命无论采取何途径,先决问题,却不外乎和帝国主义作殊死战,使中国民族获得平等独立的地位”^②。这是《东方》论者当时回味“辛亥革命”之后最大的思想启迪,也是向社会公众明确传递的舆论立场。以此一例,我们就可以窥见该刊在追忆辛亥历史影像中整体的发言方式与意旨。

四、《东方杂志》 建构“革命”话语的历史启示

通过以上梳理可知,《东方》建构“辛亥革命”话语的全部历程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清末时期,《东方》知识群以鲜明的立宪改良派形象现场介入了革命从酝酿到爆发的全过程,既有通过理论激辩对暴力革命价值观表示的拒绝,也有实际政治运作中对具体暴力活动表现的宽容;既有如实记录、快速传播革命事迹的职业敏感,也有因政治身份而使媒介生存处于困境的尴尬。总之,这一时期《东方》的政治参与性很浓厚,发言者的政治身份与刊物的舆论倾向基本混同,虽然办刊人在辛亥年力图纠正这种过于政治在场的偏颇,但因停刊而中途受挫。民

国之后,《东方》知识群的改良主义主张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已处于边缘地位,主要价值落实在社会思想认知层面,刊物也相应定位于具有公共性的现代媒介上。因此,《东方》不断追忆“辛亥革命”话题的行为,固然有曾经的亲历者对渐行渐远的革命史迹表示敬畏的意味,但更重要的意图是深度激活“革命”符号中有现实意义价值资源,与自身一直秉持的渐进社会改造理念相嫁接,为社会变革提供有自己特色的舆论空间。它用追忆的方式延伸了“辛亥革命”话语的时间维度,使自己在思想启蒙的意义上又一直处于“在场”的状态。《东方》建构“辛亥革命”话语的艰难历程首先见证了这样一条媒介成长规律: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一种舆论媒介欲进行一种有效的思想传播与社会动员,会是一个复杂、长时段的信息传递过程,其中传播者的主体性立场、媒介类型与文本呈现方式、编辑能力等等是关键性要素,它们交织而成的具体媒介形态决定了最终的话语效果。

就《东方》构建的“革命”话语系统本身而言,无论是在文本内容还是在文本形式上,都留下了许多可资启迪的价值资源。归纳起来,一是拓展了“革命”语义的现代性内涵。自晚清起,中国言论界接受“革命”语义时滋生了这样的思维定势:“革命者”的身份单一具化在以暴力手段推翻旧政体的同盟会会员身上,“革命”的话语也主要见于他们经手的报刊,而立宪派及其言论工具都是作为“革命”的“他者”登场的,“革命与改良”的话语表达把晚清的变革群体立马区隔为两种想象中不对称的力量。尽管梁启超等人在晚清时期对此进行了辩驳^③,但“革命”话语的窄化现象还是占据了后来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论坛。《东方》编者用自己的发言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这种“革命”框架。在晚清政争中,它自然不敢苟同革命派的主张,对属于同一阵营的各类立宪派也不是亦步亦

① 吴泽炎:《中华民国建国三十年》,《东方杂志》第38卷1号。

② 《卷头语》,《东方杂志》第28卷19号。

③ 如梁启超在《释革》一文中就批评了醉心于武力的“狭义的革命”,认为在广义上,“无论以平和得之以铁血得之皆是也”。见《新民丛报》第46—48合号,1904年2月。

趋、随声附和,而是“时时从高一层落想,以为国民之向导”^①,表达了自己独立的舆论立场。例如辛亥年杜亚泉对一个政党“革命性”与否的理性解释就很有代表性。他预判在未来中国任何立宪政体下,都会出现一对持激进的“进步党”与持稳健的“保守党”,尽管这两者孰优孰劣一时难以定论,但维系一个社会的正常运转须赖它们的平衡,“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扶相助而皆不可缺”^②。这里,杜亚泉从调和主义出发对晚清改良派与革命派的社会进步性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解释。民国以后,《东方》借助对“辛亥革命”的追忆重申了其固有的民主宪政、民族主义等政治主张,并结合新语境作出了与时俱进的诠释。因此,在整个《东方》出版史上会发现这样一个历史悖论现象,即其言论方式在不同历史时期都呈现出滞后于时代最激进浪潮的保守性一面,但长时段看,在近现代中国公共舆论空间中又恰恰是这些言论思想散发出真实的革命性气息。这种对“革命”语义的践行活动充分证实了如下的历史判识:“最好把辛亥革命理解为20世纪社会革命中的1900—1913年阶段,不应仅仅看做是整个政治变化的1911—1912年阶段。”^③其实我们还应该接着说:最好把辛亥革命理解为1913年以后中国社会革命中更久长的阶段。

二是创新了“革命”文本的媒介表现形式。与“革命”语义的窄化现象相一致,过往的研究对“革命”文本的指认也存在狭义化的解读误

区。那些有明确党群背景、不计商业利益的政报政刊会被贴上各派“革命”的标签,而从属于商业机构的营利性报刊则被“革命”边缘化;政治言语激昂、引领一时风潮的报刊列位于各派政治势力编就的“革命”谱系,而超越党派之见、思想多元的刊物不在“革命”与否的考评之列。《东方》的传播现象在很大程度上已突破了对“革命”文本设置的陈旧畛域。辛亥前《东方》虽然带有明显的立宪政报色彩,但刊物采用形式上开放的“选报”体例,使该刊当时呈现出既非《民报》式极端“革命”,也非《新民丛报》式极端“改良”的中层舆论形象,这是其借助特定文本样式承担思想启蒙责任的初步尝试。进入民国之后,《东方》自觉脱离政报的身份羁绊,言论“不偏于政论之一方”,“注重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④,走介绍新知、普及常识的一般学术型媒介路线。通过多次改革体例、革新内容,甚至调整编辑人员等,刊物形成了一种有容纳大、与时俱进、稳健持中的基本特质,在处理媒介社会责任与商业属性的关系时表现出成熟的理性智慧。尽管这种文本表达方式受到过激进报刊的批评甚至谩骂,但该刊不为所动,坚守“我们是舆论的顾问者,而不敢自居为舆论的指导者”^⑤,从而获得了社会公众持久的认同。因此,就媒介的“革命性”身份而言,那种急风暴雨、斗志昂扬式的文本固属理所当然,但也不应遗忘像《东方》这一类细水长流、润物无声的非正统文本的革命魅力。

责任编辑:张朝胜

① 《张元济全集》第3卷,第133页。

② 杜亚泉:《政党论》,《东方杂志》第8卷1号。

③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517页。

④ 坚瓠:《本志之希望》,《东方杂志》第17卷1号。

⑤ 坚瓠:《本志的第二十年》,《东方杂志》第20卷1号。